

历史的思考

谭天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思考

◎

谭天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集了作者二十多年来的学术探索与研究工作成果,主要集中于华侨华人与海外移民研究,及中国经济史与政治等领域;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国到海外,从学术到政务,展现了作者的深刻思考与严谨求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思考/谭天星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302-38427-4

I. ①历… II. ①谭…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0746 号

责任编辑:王巧珍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何 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22.5 字 数:41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500

定 价:50.00 元

产品编号:059126-01

序

为学长写序，诚惶诚恐。

初识天星，他是一位而立之年的博士，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领军人物，才华横溢，风华正茂。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两鬓霜华，雍容大度，俨然大将之风。虽然其岗位已不在学界，但本色不改，因此仍被学者视为同人，引为知己。

本书所收录的，就是天星治学从政近 30 年来的部分学术成果，以论文为主。最早发表的论文是 1986 年《中国农史》刊发的《乾隆时期湖南关于推广双季稻的一场大论战》，那是他在硕士研究生时期钻研经济史的成果。他博士生时期师从北大许大龄教授专攻政治史，其学位论文《明代内阁政治》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面世，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出书是极不容易的。毕业后转向华侨史，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这一学术路径，施坚雅、王赓武等前辈曾筚路蓝缕，获得了杰出成就。王赓武教授治唐史起家，曾与费正清等合作中国历史研究，后来主要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耕耘，曾任香港大学校长，被视为泰斗。施坚雅新中国成立前在四川从事农村市场的人类学考察，随后转到泰国作华人社会的田野调查，其成果分别形成传世之作。中国传统经济社会以其自身的模式延绵数千年，在世界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然而 20 世纪的不断革命打碎了传统经济与文化，既有的运行轨道在近代断裂了。所幸的是，在唐人街与海外华人社会，能够发现中华传统的连绵赓续，找到活生生的历史，或者说海外版的中华文化。古今相通，中外相融，学术激情油然而生，而且引发了不一样的视角与思考，这应该是他们成果丰硕的动因之一吧。我的研究领域与思路也和他们颇为类似，因此深有同感。而天星是少年大学生，在学界出道也早，我们以他为学长。

天星颇低调，对过去的论文进行整理出版有些顾虑。但学界与侨界的朋友认为，将他近 30 年的论文汇编成册，仍独具价值。首先，不少论文虽然发表已有年头，但因为相当部分是史学类或理论性论文，考证严密，论述精当，其学术价值不减，甚至历久弥珍。实际上，不少论文至今仍被引用和参考。譬如，其专著《崇祯皇

帝大传》由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出版之后,2008 年改编为《孤独的崇祯》,收入“中国历史知识小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继而中国广播电视大学 2010 年以《帝国中兴的悲歌:崇祯皇帝七讲》出版,再飨读者。其次,新近的论文现实感很强,而且具有原创性,给文集带来鲜活的气息。最后,细心的读者,还可从文集中去感受一个学人成长的心路历程。

“学而优则仕”,天星也走上了这一条传统文人的成功之路。当然这让学界颇觉遗憾。侨史界前辈肖岗先生,不止一次地为天星离开中国华侨历史研究所而扼腕痛惜。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周南京先生,多次当面“痛批”天星离开学术界,认为这是侨学界的一大损失。爱之深,责之切,此之谓也。事实上,天星虽然转入政界,但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虽然写的论文不像其高峰期那样多,可能“文胆”也小了些,批判精神收敛了些,但在使领馆和侨界的领导工作,使之将另一种视野和高度融入其思考之中,形之于笔端。

尤为可贵的是,身居庙堂之高,仍关注学术之野,并试图将学术力量引入政府思维,将政府视角导入学术探索之中。整合学界与政界力量,恰合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事实上,在欧美,出将入相,在学界与政界之间游弋,司空见惯。天星仍然与侨界和学界有所交往,并以其思考继续发挥影响和引领作用。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就是其倡导和推动下的产物。我个人也从中受益良多。本书又给我带来教益,略举二三如下。

其一,言由心生,文如其人。天星的研究工作开始于家乡历史上经济现象的追根溯源,此乃发乎内心的兴趣与爱好。由本土而海外,天星从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出发,贯通古今,考察从华侨文化到华人文化的变异与继承,到当今华人社会的形态与特征,形成一系列的论文,如本书第一部分所示。在驻美使馆期间,及后来的出国考察与国内接待海外侨胞的工作中,天星以诚相待,以心交往,倾注其爱心。不少侨领事隔十余年后,仍对那次交谈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对研究对象的情感,对研究领域的志趣,既是其成果丰硕的原动力,也是其成果高水平的源泉,情感流于笔端。学术研究需要坐冷板凳,没有强烈的兴趣推动,没有学术激情与冲动,很难想象能获得高水平的成果。

其二,历史脉络的梳理,古今贯通。譬如,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到当今国家领导人的侨务思想,一支笔前后 20 年论述,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人。不是应景之作,而是脉络梳理之下水到渠成的认识与成果,这几篇论文汇集于本书第二部分。又如,关于中国移民的历史,从古代移民的考证,到近现代移民的阐发,再到当代移民的考察,包括少数民族的境外迁移,每一项研究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作者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形成了难能可贵的系列成果,呈现出清晰的脉络。同时,

这种历史感又融入其相关研究与工作中,从而具有历史的深邃与高度。

其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相得益彰。论从史出,贯通古今的侨史研究,形成系统性与理论思维。与此类似,来自实践的认识也经提炼和整理升华为理论,或为理论提供基础。侨务理论与战略在本书占有相当分量,集中于第三部分,显示了本书的高度。而理论运用于具体的侨务工作,以其系统思维跳出就事论事的藩篱,不被具体琐事迷乱了方向,遇到问题不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本书中的侨商工作、地域侨务工作、民族问题等具体事务上,都体现出理论思维所带来的前瞻性与大局观。

其四,“学术评论及其他”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情趣。对研究动态的把握,需要阅读大量的论著,没有兴趣驱动是做不好的。对学界前辈的访谈,则体现了学术传承的担当与使命。在本书中读者还可以发现,一次旅行、一场会议,引发作者的感想与思考,继而形成反思性或启发性的文字。这种有心人不多见,而研究能力与认识水平就是在这种日积月累中不断提高的,正如本书中的一个标题——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理论来自实践,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对此我作为国侨办的专家咨询委员感受至深。天星与国侨办的同仁,几乎随时都与侨界同胞在进行访谈,广泛征求意见,鼓励海外华侨华人建言献策,这些都变成了日常工作,如同家常便饭。而中国侨资企业的普查,海外侨情的全球性调查,这些高门槛的艰巨工程最终都得以完成,非得有坚定的信念来支撑。在调研基础上进行资料甄别与整理,并力求数据化,定量分析,科学论证。凡此大量的工作当然都在本书之外,但为本书的相关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龙登高

2014年5月1日

历史的意义(自序)

历史是什么？历史的意义何在？沉静得闲时常思考这个问题。

很简单，历史是过去。逝去的、经历的，就是历史。自己经历的，记忆深刻，酸甜苦辣，是背负更是财富。人类、社会、国家、民族等都有其昨天，漫长的发展历程，多少风雨剥蚀、风雷激荡，个体是渺小的。

我和历史有着不解之缘。十年的历史专业修炼不谓不长，好奇、迷茫、寂寞、思索，虽然有几本书、一些文章，但准确点说，未得正果。从明朝马政、清代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到明代内阁政治，试图通过专题研究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史有所心得。收获是有的，因为从中得到了知识、经验、智慧和力量，还有教训。只是以往中国历史教科书讲述阶级斗争的较多，农民起义和王朝兴替，显得将历史简单化之，但还是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周期律，统治者和人民的较量与妥协，以及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后来参加工作，遇事都喜欢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历史的、发展的、完整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事物的本质和真相，万物内在的规律，进而坚定对未来的信心。

历史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是连接今天、启迪明天的过去。

中国人都为中国悠久而绚丽的历史和文化骄傲。五千年文明存续并走向新的辉煌，的确是这个地球上少有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激扬，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渊源。《论语》《孙子兵法》《道德经》是中国人对人类智慧的极大贡献。儒家先师孔子提倡为政以德，内圣外王，仁、义、礼、智，见利思义，有教无类，追求中庸、大同、和谐。道家老子更是位哲学家，无为而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揭示万物道在恒定，物极必反。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法家强调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渐成为历代主流意识，并远播域外，形成儒家文化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所谓德治与法治，仁政和礼乐，莫不始于此，得诸家要义而贯通之，则天下莫不治。

汉唐盛世，国家统一，文化繁荣，国威远扬。汉代从分封诸侯到中央集权，唐代

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藩镇割据，反映出帝国治理体系的利弊相生相克。唐长安盛时人口近 50 万，是那个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的文化中心、国际化都市。本土道教外，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竞相斗奇。许多国家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来唐学习，大唐文化影响了日本等国的革新发展。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文化的交流，各民族的融合，展示了唐朝开放、包容、自信、文明的大国风范。《唐六典》中十乐就有康国乐、安国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此也即今之所谓软实力。

郑和七下西洋，200 多艘船、2.7 万人的船队，遍访今东南亚、东非、麦加等地 30 多个国家，是古代中国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远洋航行。这较之麦哲伦的环球行早一个多世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 87 年。许多史学家、海洋学家称之为中国发现世界。以往关于郑和多为其下西洋的动因迷惑，如寻找建文帝，不过从全过程看远非如此。永乐皇帝自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考虑，主要的还是宣扬国威，促进对外交往和万邦来贡。郑和没有占他国一城一池，每到一地是宣告明朝皇帝威德和赠送礼物。《郑和家谱》记载即是明证：“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德，尔等祇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下西洋花费了明朝大量资财，没有发展经济，壮大国力，但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即是和平外交、仁义之师文化精神在所历各国的传颂。

康乾盛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创造的一个神话。西方史学家称为“Hing Qing”，即大清盛世。除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疆土辽阔、多民族共处。1790 年，全国人口超过 3 亿人。据研究，清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 1/3。极盛时国土面积 1310 万平方公里，“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真正形成，这是前所未有的。清奉行满洲优先，与蒙古各部联姻，推行盟旗制，以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设立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来管理西藏，西南改土归流，编撰《四库全书》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拉拢。承德外八庙、布达拉行宫，以及乾隆帝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足见当局对满汉蒙藏民族治理的心机之深。

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留给中国的一个耻辱。西方以利炮坚船打开清朝闭关锁国之门，以鸦片毒害中国人攫取巨额利润，近代中国沦入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历程。甲午海战一败，貽患无穷。英法德美日俄意奥八国联军 5 万余人，50 余艘军舰，如入无人之境。《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掀起一波波瓜分中国恶潮。帝国威严颜面扫地。其实打败大清帝国的是它自己，封闭自大、贪腐盛行、民不聊生、思想僵化是其根本原因。近代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试图学习西方，

变革图强，无奈体制机制积弊太深，无力回天。落后就要挨打，内斗必败无疑，这是铁律。

近代中国也是中华民族抗争图存的百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激发了中国人民族振兴、国家统一的极大热情。“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旗帜，也是知识分子探索民族前途的历史使命感的体现。八年抗战，把日本侵略者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结束了中华民族被欺凌的苦难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个令中华民族扬眉吐气、走向复兴的响彻寰宇的划时代声音。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中国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天朝帝国心态是有害的，与世界平等相待、交流借鉴，联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是必然要求。中国人走向世界、探索世界古已有之。中国人移居海外在明清时增多，但被国人瞧不起。很长时间中国人出国并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更没有炮舰保护下的海外移民。但是，他们在海外生存发展成功了，而且融入当地、贡献当地，更重要的是不忘祖国家乡，甘心回馈故里。华侨，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写的名字，如同毛泽东主席赞誉陈嘉庚先生为“民族旗帜，华侨光辉”。祖国给华侨更多的关爱是应该的，是值得的。西方的月亮不比中国圆，中国人要看得起中国人。

《历史的思考》主要收录了笔者多年来关于历史以及侨务诸多方面的文章，也有自己的经历，有点杂，一些文字现在看来显得稚嫩或有不当之处，为保持原貌，未做多少改动，但愿对过去有所总结。欢迎诸君批评指正。在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鼓励下结集面世，毕竟是件难得的事。

一个人可以忘记很多事，但祖宗不能忘，本不能忘，历史不能忘，尤其是国家的、民族的历史。

谭天星

2014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龙登高	I
历史的意义(自序)	谭天星	V
第一篇 移民与华侨史		
华侨历史的意义		2
华侨对辛亥革命贡献的再认识		9
变异与继承:谈从华侨文化到华人文化的发展		16
东南亚华人文化发展大趋势及其思考		24
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的保持与族群关系的演进		28
关于华人社会是否实际存在之我见		42
论现代海外华族与华人社区		51
近些年来我国公民移居海外情况之管见		61
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境外迁移初探——以新疆、云南为例		68
当代华商财富增长管窥		78
第二篇 侨务理论与外交		
试论孙中山的华侨观		84
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历史意蕴与当代价值		96
学习毛泽东的侨务思想 做好新形势下侨务工作		103
邓小平侨务思想的精髓及其时代意义		108
重温邓小平对海外关系的论述 推动侨商事业发展		117
用中国梦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		121
第三篇 侨务战略与实践		
浅谈战略思维与我国侨务工作		126
新形势下侨务工作战略意义的再认识		131
关于侨务资源战略的若干思考		135
侨务资源战略与中国和平发展的思考		139
关于侨务工作为中国发展大局服务的几点认识		148
华侨华人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154
浅谈海外华商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162
从“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看当代中国侨资企业的发展		167

走精品路径推动侨务经济科技工作向纵深发展	173
做好新形势下侨商会工作	177
华侨华人在境内投资创业权益保护问题的研究	179
牵线搭桥,排忧解难 全力为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创业服务	185
整合侨外资源 服务于湖北跨越式发展	192
发挥侨的优势 促进区域发展:福建的经验与思考	196
第四篇 经济与城市史	
乾隆时期湖南关于推广双季稻的一场大论战	204
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	211
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	221
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初探	231
清前期两湖农村的租佃关系与民风	242
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253
中西城市发展周期的规律与非规律性	267
第五篇 政治史与人物	
中国古代相权之演变	272
内阁权力与明代政治	278
崇祯皇帝的宗教信仰分析	294
湖广分省时间小议	300
第六篇 学术评论及其他	
中国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回顾	304
务实要典 传世之作:《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出版感言	312
深化地方侨史研究	314
华人对越南经济发展的贡献	317
宫廷饮食浅见	321
陈怀东先生及其华侨华人经济研究	324
这是一份纪念	329
学习就要有认真、虚心的态度	33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侨情调查工作杂议	333
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	335
爱心浇注事业的辉煌	338
助人助己 积石山之梦	341

附录

第一篇

移民与华侨史

华侨历史的意义

中国人移居海外有着悠久的历史。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构成了近现代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特殊而意义深远的现象。现代意义上的华侨是指在海外定居并保持中国国籍的中国侨民。华人则是指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及其后裔在异域谋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并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为住在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一部华侨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一、苦难、奋斗的历史

中国海外移民历史上称为“唐人”“华人”“中华人”“闽粤人”“中国贾人”“华民”“华工”等。“唐”与“华”即中国,应该说是他们的鲜明特征和印记。移民海外绝对是一个艰苦的选择,有时甚至是屈辱的历史。

(一) 古代中国移民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9世纪以前的生成阶段。相传公元前219年,徐福征发童男童女3000人出海求仙,“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在日本终其一生。成为中国人出海的鼻祖。以今天中国版图而言,由于政治、军事原因迁居于外者如朝鲜、越南等众多。晋、南朝时移居日本者达1.8万人。唐朝僧人东渡日本传授佛教经义,有名者如鉴真。

第二个阶段是10世纪至16世纪初的发展阶段。中外海上交通的发达为中国人出海创造了条件,罗盘运用于航海,大批商人出洋经商。10世纪,阿拉伯人马素提在《黄金牧地》一书中记载,苏门答腊有“多数中国人耕植于此岛,而尤以巴邻旁(今巨港)区域为多,盖避国中黄巢之乱而至者”。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明朝张燮的《东西洋考》、马欢的《瀛涯胜览》等文献,留下了许多关于南洋华侨的记载。郑思肖的

《心史》称,宋亡后,“诸文武臣流离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明代,广东梁道明雄踞三佛齐,“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爪哇的杜板有闽粤流聚居者约数千家。在菲律宾,闽人“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中期,在爪哇、婆罗洲、菲律宾、泰国、马来半岛以及越南、柬埔寨、朝鲜、日本等地莫不有中国人定居,约有15万~20万人。这时的华侨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第三个阶段是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高潮阶段。鸦片战争前,东南亚、东亚等地的华侨人数约有100万以上。1820年,泰国曼谷的华侨即有44万人。其迁徙海外有明末清初王朝更迭、战乱难民的原因,也因16世纪后期倭患平息后,海禁开放,私人贸易活跃,出洋俨然成为一种时尚。谚云:“若要富,须往猫里雾(今属菲律宾)。”西方殖民势力对东南亚逐渐控制后,依靠与中国人贸易和劳力支撑。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成为出国的主力。在东南亚、东亚几乎遍布华侨足迹,如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万丹、泗水,马来半岛的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泰国的北大年、曼谷、宋卡,越南的堤岸、河仙,缅甸的仰光,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日本的长崎等,有特定的华侨居住区,最初的华侨社会开始形成。1740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华侨的红河起义,菲律宾华侨反抗西方殖民者的斗争,在当地民族斗争的历史上也铭刻了重重的一笔。这时的皇朝统治者采取“弃侨”政策,在他们眼里华侨是“一群背弃祖庐、一心逐利的逃民”,是“啸聚海道、劫掠商船的罪民”。1603年,西班牙屠杀菲律宾2.5万名华侨时,明朝统治者认为这是咎由自取,“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可可惜”。清朝实行禁海令,雍正帝说:“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不论年代久远,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漂流外国者愈众矣。嗣后应定年限,若逾期不还,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怜惜。朕意不许令其复回原地。”华侨在外不仅得不到国家的庇护,反而视为化外之民、乱民,其境遇可想而知。

(二) 近现代中国移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散布范围最广、产生影响最深的海外移民时期

一般估计至1949年,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约有1000万人。移民的主体是劳工,商业、政治性移民次之,文化、亲属团聚等又次之。这些移民90%在东南亚,之外,美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等地也有大批中国移民。当代世界华侨华人分布格局基本上是随着这一时期中国海外移民而奠定的。

近代大规模移民现象,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的加深,农村自然经济的日渐解体,下层民众日益贫困化,以及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美洲、大洋洲、非洲的大量劳工需求等因素剧烈作用的结果。清政府屈于外国列强压力,

被迫同意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做工,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一律听其自便,不得禁阻。华工出国如浪汹涌。

以契约移民方式为主的劳动力输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廉价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属于经济性质的和平移民。契约工人也称苦力,俗称“猪仔”。“猪仔贸易”也称“苦力贸易”。“猪仔”成了近代契约华工悲惨命运的形象写照。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猪仔贸易”最为盛行。澳门、香港和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上海等)是国内贩运华工的中心,新加坡和槟榔屿是转贩世界各地的中心。“猪仔”们被掳掠、诓骗而入“猪仔馆”,被强制按上“自愿出洋”的手印,以一纸契约而被装上船只,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海上浮动地狱”之旅。到目的地,有半数以上的“猪仔”成为海底冤魂。在古巴种植园,华工在契约期间的死亡率竟有75%。

晚清政府对于拐贩人口进行了打击。1866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的移民公约中规定,凡用暴力或欺骗手段将中国人贩运出洋者,一经查出,即行正法。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对华工进行了限制和排斥,“猪仔”贸易趋冷。晚清政府也采取了“护侨”政策,在美洲、东南亚等地设立领事馆,还派遣舰队巡视华埠,帮助设立中华商会,创办学校等。

另外还有两个移民小高潮,一是一战期间,英、法、俄在中国北方招募赴欧参战华工23万人;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战乱导致大量外移的难民。当然也发生过福州籍移民开发诗巫(今属马来西亚)之举,达2万人。

近现代移民对海外华侨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在出洋的方式上是最黑暗的一页。从海外华侨的生态来看,随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华侨社区或聚居区在世界五大洲散布。以劳工为主体的特质决定了华侨的艰辛命运。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唐人街成了在美华侨的避难所。二是华侨社团组织的活跃。为了相互扶持,对付来自当地社会的压力,华侨纷纷组织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团体来保护自己,各类宗族、帮派组织兴起。三是华侨经济兴起。华侨从事矿工、种植、商贩,经营商行、批发、中介,成为厂主、店主、种植园主等,经过打拼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四是华侨社会与中国社会联系密切。

(三) 当代中国移民呈现多元和多样化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影响海外华侨社会发展的两个极为重要事件。20世纪60年代以前,独立后的东南亚民族国家不再欢迎中国移民,有的是禁止。一段时间,除香港、台湾地区的海外移民外,中国大陆很少有海外移民。中国改革开放是影响中国海外移民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通过探亲、留学、劳务、婚姻乃至投资等多种方式出国,形成

新的移民潮,开启了新华侨的历史。在东南沿海地区一时为出国移民而不惜铤而走险,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偷渡”等非法移民现象。仅1979—1990年间中国大陆海外移民有80多万人,1950—1990年间台湾海外移民有80多万人。较之近代移民,这一时期的新移民多是自发、和平的,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是知识性或技术性移民,西方发达国家是主要目的地。移民群体的结构性变化使海外华侨社会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

当代中国海外移民为海外华侨社会输送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新的气息,对传统侨社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海外侨社影响最大的事件当推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兴起和中国单一国籍政策的实施。不搞双重国籍,主张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国籍,这是新中国一代领导人的重大决策。1955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条约,之后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建交时都宣布凡加入居住国国籍的中国血统人不再具有中国国籍。中国政府保护华侨的正当合法权益,对于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则不再要求他们政治上效忠中国。华侨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从华侨到华人,加速了融入当地的进程,逐渐完成了从华侨社会到华侨华人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华侨华人以居住国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平台,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心态等方面转向以当地为主的价值取向,而且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势不可当,这也是我们今天认识海外华侨华人的基本面。在东南亚已看不见华侨社会,华人、华族的发展取而代之,华人是当地多元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华人经济也从属于当地经济整体。

新移民的涌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本性传承、中国的发展强大、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民权运动的开展等,使华侨华人趋于保持自我特性且积极融入当地发展。华侨华人并没有被彻底同化,同化摒弃了强迫的形式,自然融合获得更多的赞同。人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华侨一旦选择融入,华侨华人社会逐渐形成,其形象也有了全新的改变。20世纪后半叶,华侨华人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科技人才不断涌现,社团组织更加活跃,对当地生活积极参与,族群国际化联谊日渐加强,一些国家华人政治明星崭露头角。华侨华人是国际上不可忽视的一股积极促进沟通 and 发展的力量。当然,华侨华人地位的真正改善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自身继续不懈努力。

二、爱国爱乡的历史

华侨与中国血脉相连、同根同脉,对祖国的感情融入身体和灵魂深处。不管在外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受尽了多少苦痛折磨,漂泊了多长时间和离乡多远,华侨

对祖国、对故乡的思念始终不能隔断，只会历久弥坚。爱国爱乡是华侨的主要精神支柱和特征，是最值得称道的优秀品质。

从历史上看，华侨有过被当政者忽视甚至排斥的时期，但华侨纵使有种种不满和心结，也没有忘记家乡和国家。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华侨出现了三次爱国高潮。

第一次是20世纪初对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贡献。在武昌首义之前10次武装起义中，华侨是骨干。黄花岗起义72烈士中2/3为华侨。兴中会300多名会员中200多位为华侨，同盟会也成立于日本。华侨在组织发动、舆论宣传、人力财力上的支持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保证。孙中山先生称“华侨乃革命之母”。

孙中山与华侨有不解之缘。其长兄孙眉为檀香山“茂宜岛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均在海外发端，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启发、鼓舞了华侨，华侨的慷慨捐助、热血参与和追随在关键时刻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华侨邓荫南变卖全部家产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追随孙中山近30年，去世后孙中山赞其“爱国以命，爱党以诚，家不遑顾，老而弥贞”。

华侨捐款支持革命，在经济上起了决定性作用。1895—1912年，华侨捐款约800万港币。其意义更在于义捐的广泛性，不仅是华侨资本家捐出巨款，而且许许多多的工人、商贩也参与其中。越南黄景南以卖豆芽为生，将一生积蓄几千元全部捐出；挑水工人关唐，每担水一文，捐出半生血汗3000元；新加坡林受之原开设几十家橡胶厂，为革命用尽全部家产，以致子女不得当雇工。正如孙中山所言“慷慨助饷，多为华侨”。华侨捐助，不求回报。

华侨参加革命更是可歌可泣，感天动地。新加坡华侨李文楷参加广州起义前说“吾致志祖国之时至矣”。越南华侨罗联起义被捕，说“吾必舍生取义”，“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望后继者努力前进”。“舍生取义”也是一代华侨革命烈士的真实精神写照。

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的危难关头，华侨回国参战、捐钱捐物，前赴后继。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乃至东南亚抗战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起来，聚集力量，支持抗日。如有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南侨总会、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等。华侨在海外争取国际援华、抵制日货、举行请愿等，声势浩大。突出的贡献是经济援助，据计各类捐款、公债、侨汇等支持达70亿元。华侨捐献各种药品、车辆、服装、飞机等。华侨捐款遍及全世界，有华侨的地方就有侨捐，不论贫富老幼，以抗日报国为荣。许多热血华侨回国参战，组织各种团体回国服务，如东江、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南洋华侨机工，华侨飞行员，奔赴抗日根据地等，许多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篇章。陈嘉庚率52位南洋各国侨领组成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走遍了全国19个省区抗敌的前线和后方。陈